

明清时期民勤的移民、宗族与多元文化

——河西走廊社会经济史研究之四

谢 继 忠

(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, 甘肃 张掖 734000)

[摘 要] 明清时期大量移民进入民勤, 垦荒屯田, 发展贸易, 有力地推动了民勤经济发展。移民对民勤文化的影响, 主要表现在兴办教育, 融汇外来风俗, 吸收外来雕塑艺术, 利用外来冶铁技术, 学习外来建筑技艺, 引进外来造船技术, 以及刻印书籍等方面。外来官员在民勤任职, 他们大多定居下来, 其子孙连绵繁衍, 形成了大宗族。宗族重视文化教育, 参与文化教育活动, 培养了大批人才, 使民勤出现了“文运之盛, 甲于河西”“谢家一门三知县”的盛况。宗族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建树, 还包括编修家谱、兴办文社、编修县志、修建宗祠等。移民、宗族与文化的良性互动, 成为明清时期民勤社会发展的原动力。

[关键词] 明清时期; 民勤; 移民; 宗族; 文化

[中图分类号] K248; K249 **[文献标识码]** A **[文章编号]** 1672-0520(2025)03-0017-11

[DOI] 10.13874/j.cnki.62-1171/g4.2025.03.003

位于河西走廊东部石羊河下游的民勤, 明代设镇番卫, 清代设镇番县, 因明清时期大量移民的迁入, 得以大规模开发。在经济开发的基础上, 形成了强大的宗族势力, 宗族对当地经济、教育、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移民、宗族与多元文化的良性互动, 使民勤成为丝绸之路上多元文化交流的典型区域。

近年来潘春辉对清代镇番移民问题进行了研究, 认为清代前期, 中原移民大量进入镇番, 成为该县人口的主体, 并对当地社会面貌等产生重大影响; 清代中后期, 该县人口不断外移, 使其成为人口大量外迁的地区。^①李万禄则认为, 明清两代向镇番移民, 主要是明洪武、万历时期, 清代主要是乾隆时期。清代康熙时, “民勤人口开始向新疆迁移”。^②李并成认为清代前期、中期民勤人口持续增长, 至清乾隆时民勤人口开始向新疆迁移。清代后期, 由于人口剧增, 盲目开垦土地, 民勤绿洲已无法承受巨大的人口负担, 沙漠化的危害随之而来。故民勤绿洲沙漠化的主因就是人口增长超过了绿洲资源(主要是水资源)的承载力。^③在清代甘肃科举家族与地方

作者简介: 谢继忠, 男, 甘肃山丹人, 教授, 研究方向: 明清史、西北开发史、甘肃区域史。

① 潘春辉:《从入迁到外流: 清代镇番移民研究》,《历史档案》2013年第1期。

② 李万禄:《从谱牒记载看明清两代民勤县的移民屯田》,《档案》1987年第3期。

③ 李并成:《民勤县近300余年来的人口增长与沙漠化过程——人口因素在沙漠化中的作用个案考察之一》,《西北人口》1990年第2期。

社会的研究中，陈尚敏探讨了清代镇番谢氏家族和卢氏家族从事地方教育、编纂地方志的活动^①。目前，学术界对民勤的宗族与文化的互动研究还比较薄弱，本文就明清时期民勤的移民、宗族与多元文化及其相互作用作些初步探讨。

一、明清时期民勤的移民与经济发展

（一）明清时期民勤的移民与农业开发

1. 明代民勤的移民与农业开发

明洪武三年(1370)右丞相魏国公徐达、都督冯胜等征讨甘肃时，镇番只有畜牧业。《镇番遗事历鉴》云：“是时，镇邑无县治，亦无熟田，民人徙此，惟牧畜而已。”^②

洪武五年(1372)，设立镇番营，王兴任掌印指挥，这是明代民勤最初的军事建制。同年秋，明朝政府“飭命山西、河南等地民人约二千余众，迁徙是土，多居于蔡旗、青松环围”。^③蔡旗、青松即今甘肃民勤县蔡旗镇、薛百镇。这是明代民勤大规模移民的开端。

移民屯田，使人口逐步增加，进一步推动了民勤农业开发。洪武六年(1373)，屯田有三百四十顷五十八亩。至洪武十九年(1386)，“本营守墩驻军共三千五百二十名，农工商共五百四十户，三千五百又七人”。^④人口的增加，有效地解决了农业劳动力问题，屯田成效初步显现。

洪武二十九年(1396)，设立镇番卫，屯田规模进一步扩大，在籍农民达五千五百人。

屯田的扩大，使镇番人口大幅增长。至永乐十五年(1417)，民勤有二十四百二十三户，人口六千五百一十七人，人口较洪武十九年增加了三千多人。

为了加强对移民的管理，镇番卫为移民(又称客民)颁发‘户照’。明宣德九年(1434)夏，“有司依令颁发客民寓居户照，镇邑共发给三十四枚”，其中为圣容寺番僧、地藏寺游僧发放六枚，“余为山、陕客民，贸易至此”。^⑤这些移民多为山西、陕西商人。

大规模的移民屯田，使民勤的土地得到有效开发，至嘉靖十三年(1534)，共有耕地五千二百二十二顷二十二亩。

至明末崇祯年间，又有大量移民进入民勤。崇祯六年(1633)，参将王之鼎上《实边疏》，随后崇祯皇帝敕令“遣民充边”，阶州(今甘肃武都)庶民一百二十户移民民勤。这次是从甘肃东部武都地区迁来的移民。通过这次移民，民勤共有五千五百三十三户，人口达三万余人。

总之，在明朝政府的政策激励下，移民的进入，人口的增加，土地得以大规模开垦，使民勤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。

2. 清代民勤的移民与农业开发

至清代，各地移民继续迁入民勤，土地开垦达到高潮，使民勤经济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。

康熙年间，汉、蒙、回、藏等民族人口不断增加，共同开发民勤农业和畜牧业。清康熙四十八年(1709)，境内客民共三百零二户，一千一百一十七人。“蒙人为多，次则回，再次番”，分居城内、苏山、枪杆岭山等处。

雍正二年(1724)，改镇番卫为镇番县，杜振宜为首任县令。此后，移民和屯田规模更大。雍正四年(1726)，李海峰等七十二户农民自青松堡迁徙柳林湖屯田。屯田由坝区向湖区推进。

① 陈尚敏：《清代甘肃科举家族与地方社会》，《地方文化研究》2021年第4期。

② [清]谢树森等编撰，刘润和校注：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22年，第1页。

③ [清]谢树森等编撰，刘润和校注：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，第3页。

④ [清]谢树森等编撰，刘润和校注：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，第11页。

⑤ [清]谢树森等编撰，刘润和校注：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，第28页。

雍正七年(1729)清丈地亩时,民勤屯、科地上地六百零三顷八十五亩。至乾隆元年(1736),柳林湖屯田成效显著。“至于其地,颇称沃壤。初屯止宜种麦,今百谷蔬菜皆可收获。若今民营阡陌,耕东息西,亦镇人之利藪也。”^①所谓“耕东息西”,是指土地轮耕,耕一年歇一年,以此轮耕,当地俗称“歇沙”。

乾隆十三年(1748),民勤全县有户五千六百九十三户,柳林湖有户二千四百九十八户,户口数达到一个高峰。

清代对本土人口和外来移民统设保甲,进行一体化管理。清乾隆二十二年(1757),“奉敕更定保甲之法,令每户岁给门牌。十户为牌,立牌长;十牌为甲,立甲长,三年更代;十甲为保,立保长,一年更代”。^②通过设立保甲制度,这就使外来移民融入了民勤社会,并成为民勤农业开发的重要力量。

由于大量人口迁入和土地的大规模开垦,时人发出了限制开垦规模的呼声。《镇番遗事历鉴》作者谢广恩曰:“据雍正十二年奉饬开垦,所额地亩为二千四百九十八顷五十亩,距划定之数尚欠一百六十余顷。而阅三十年至乾嘉之交,柳林湖实垦地已逾三千顷,因时人有‘缓垦’之议。”^③

随着移民、垦荒规模的不断扩大,民勤人多地少、地多水少的矛盾愈益突出,至嘉庆十八年(1813),官府宣布停止向本县移民,并停止垦荒。“屯务署奉文裁撤。马王庙湖、六坝湖及柳林湖暂停垦荒,亦不收接外埠屯民,以省地节水故也”。谢广恩感慨地说:此时停止移民、垦荒,“已嫌太迟。乾隆之季,已有人稠地少、水不敷用之吁请。至嘉道间,上游来水显见减少。镇人屡讼于凉府,力控上游强堵水流,断绝水路。历官虽时加勘验,以理公判。无如武民有近水楼台之便,旋判旋犯,殆无休已”。^④因此,停止移民、垦荒,就成为民勤解决人口与土地、水资源矛盾的必然选择。

(二) 明清时期移民在民勤的贸易及其影响

河西走廊一带,历来以农耕为主,素无经商的传统。明清时期外来商人进入民勤,不仅带来了商业,繁荣了经济,而且改变了人们的观念,使人们对商业贸易有了新的认识,本邦商人也逐步崛起。同时,晋商修建晋西会馆、捐助崇文社等,对民勤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洪武年间,已有外来商人至民勤贸易。如查锦,其始祖查勇在洪武年间从山海关贸易至民勤,随定居下来,家族不断繁衍。据《镇番宜土人情记》记载,查锦为查苧之子,其先世为山海关人氏。

明英宗正统九年(1444),凤阳人王安贸易至镇番。同年六月,赁地六分五厘,“于城东街筑铺店”。这是民勤最早的商号。时人卢生华“以为镇邑商号自安始。其谓‘商号’者,客商之意也”。^⑤

明成化十五年(1479),宁夏人纳维德来镇番贸易。纳维德最初租赁民程公望房二间,后“嫌其狭隘”,遂于城南“展修”店铺。

由于受外来商人的影响,民勤商人也开始长途贸易,足迹远至西域鄯善、陕西甘泉及蒙古

①[清]谢树森等编撰,刘润和校注: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,第276页。

②[清]谢树森等编撰,刘润和校注: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,第301-302页。

③[清]谢树森等编撰,刘润和校注: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,第305页。

④[清]谢树森等编撰,刘润和校注: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,第363页。

⑤[清]谢树森等编撰,刘润和校注: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,第34页。

一带。正统十一年(1446),邢琦、费旷等贸易至鄯善等地,带回来各类西域土产,其中“葡萄最佳。”成化十九年(1483),李达贸易甘泉,因“货被盗罄”,最后“倾家归来”。康熙二十二年(1683),“邑人张从言贸易北蒙,大富。以其地荒气凉,不适久住,遂携资货万里归里。途径亦集乃大青山,道出强人,呼啸而至,尽将财货劫掠”。^①光绪二十一年(1895),祁开秀,也在甘泉贸易。光绪二十七年(1901),“县人王有条寓居阿拉善巴音经商,本利逾万”。^②

在清代外来移民中,晋商最为活跃,实力最强。

嘉庆二十年(1815),常年在镇番经商的晋商樊奎润,在县城南街捐资修建晋西会馆,自任馆长。八月十五日邀同乡聚会,镇番县令李荣曾亲临祝贺。晋西会馆的设立,开会馆建设之先河,使会馆成为当地经济和文化的一个重要据点。

嘉庆二十三年(1818),晋商吴钦德素与邑孝廉王席珍交往密切。当年皮毛贸易市场行情见涨,他们获得巨额利润。在王席珍的劝说下,吴钦德拿出三百两银子捐助崇文社。为表彰他们的这一壮举,镇番县令谢培赠送了“德钦西垂”的匾额。崇文社或兴文社,皆属于民间文化组织。“兴文社是清代甘肃民间设立的一种助考组织,其职能主要是为本籍参加乡、会试士子资助盘费”^③。

晋商捐助崇文社的善行,对清代民勤文化发展具有重要助推作用。

二、明清时期移民对民勤文化的影响

明清时期,由于大量移民的迁入,他们带来了全国各地的文化。《镇番宜土人情记》云:“镇邑地处边塞,远距城市,土厚沙深,交通阻隔,人民杂聚,风俗交烜。于语音一端,南腔北调,东韵西声,往往令来官斯土者瞠目结舌,不知所云。”^④经过多种文化的融合,从而形成了民勤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,并对民勤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明清时期移民对民勤多元文化的影响,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
(一) 兴办教育

从洪武年起,直至清末,兴办教育成为治理民勤的头等大事。在官方的主导下,民勤士绅始终积极参与,贡献良多。这正是明清时期民勤文化教育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开馆讲学之风,由来已久。洪武二十五年(1392),“孟公大都以其遐年辞职归里,捐一千金,开学授徒。说者谓大都乃镇邑教授之原始”。孟大都,任甘肃庄浪掌印千户,以八十二岁高龄“告归故里”,同时“开学授徒”,开民勤教育之先河。甘肃临洮人刘玺于成化五年(1469)来民勤开馆讲学,被誉为“镇番盛事”。据《镇番遗事历鉴》记载:“临洮人刘玺因时逢国子命往各边卫分发,承兄(刘)杰荐,至镇开馆讲学,从者数百人。阖邑一时轰动,投于门下者竟三五百众。国朝学台鉴衡公谓之‘镇番盛事’者,即指此。”^⑤刘玺之兄刘杰,任镇番卫守备,故推荐其弟刘玺来镇番开馆讲学。鉴衡公即镇番乡绅何鉴衡。这说明刘玺开馆讲学受到镇番民众的积极响应。

成化八年(1472)刘玺病危,请求还乡。当他离开镇番时,“卫署官吏暨地方遗老生员数千人扶輶相送”。

成化十二年(1476),山西翼城人周琮为镇番首任训导。周琮“为官八年,修建学宫,教士有

①[清]谢树森等编撰,刘润和校注: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,第225页。

②[清]谢树森等编撰,刘润和校注: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,第454页。

③陈尚敏:《清代甘肃科举家族与地方社会》,《地方文化研究》2021年第4期。

④[清]谢树森等编撰,刘润和校注: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,第311页。

⑤[清]谢树森等编撰,刘润和校注: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,第46页。

方,文风大振,至今颂之”。次年,“卫训导周琮申请都御史马明远,于县治东厢创修文庙成,东近城垣,西通学署,为镇邑一巨制焉。”^①周琮修建学宫、创修文庙,对镇番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成化十四年(1478),“镇邑于是年首开选举之例”,段珽为贡生。段珽“为镇邑首贡者。后与文朴、李翰等呈请开学,镇邑文风,实首倡之。再后,以明经选甘州卫训导,旋升河南郑州府教授”。^②

在镇番任职的官员重视文化教育,形成了优良传统。如成化二十一年(1485),“滁州人魏显谏以镇抚职镇。下车伊始,谒拜文庙,瞻询儒学。未几,即慨解私囊,捐制钱八百缗,以济儒学添置之需”。^③弘治十六年(1503),“前总旗孟鼎告辞归里”,授徒著述,有《西窗剪灯杂录》传世。

至清末,民勤名士聚徒讲学,蔚然成风。如光绪十三年(1887)十二月,文林郎卢逢澍卒。据《卢氏人物行略录》记载:卢逢澍“性滑稽好学,洎乎晚年始入泮,设铎梓里三十余年。迪启后进,谆谆善诱,故里中子弟成立者,多出其门下。公擅书法,而尤精小楷正体”。^④光绪十九年(1893)三月,“武庠生卢登魁卒于里”“族人大祭,葬于城近仰沟叶家地。公性活泼,精神轩昂,通文好武,精于骑射,弱冠采芹,乡荐未售,遂设馆授徒,镇邑是时生童多赖其造就”。^⑤

学子发奋读书,亦是民勤文风浓郁的重要原因。如李相、文衡即为佳例。据旧志记载,李相家庭奇贫,利用“藁蒿读书,寒暑不辍”。嘉靖七年(1527)中式第五十三名,授云南大理府通判。嘉靖十四年(1535),文衡被授予四川遂宁县主簿。《镇番宜土人情记》曰:文公家至贫,“以麻杆燃火读书,士人钦之”。

总之,正是由于官府、地方士绅等重视教育,一些乡耆身体力行授徒、著述,加之学子发奋读书,才使明清时期民勤出现了崇尚读书、人才辈出的局面。正如方志云:“镇邑地介边陲,明以前简册已无所考稽。自成化以迄国初,人才鹊起,甲于河西。”^⑥

(二) 融汇外来风俗

民勤打春牛习俗,深受苏杭风俗的影响。明永乐二十一年(1423),善塑泥牛的镇番乡民何沅,在立春之前,“塑春牛、芒神于卫署门前。牛大如真牛,作行走状。芒神比若童孩,戴竹笠,履草鞋,手执短鞭,面有笑靥,极作顽皮之状。”至立春日(俗称打春),官民纷集观看。镇番卫指挥方杰欲按当地“旧俗鞭牛”,即打碎土牛,以示打春。客商周济民向方杰建议:“斯牛忒活,碎之令人可惜,莫如效苏杭风俗,以米豆之物,抛打相竞,取年丰意。”众人附和,“遂以五谷抛打之。后,何沅既逝,仍以鞭打春牛”。^⑦镇番打春牛的习俗效仿了苏杭风俗,一直延续下来。

元宵灯展,尤以晋商制作最为精美。明成化二十三年(1487),元宵节观灯,以山西张氏“德义商号”制作的花灯最为著名,“观者比肩,啧啧称赞不绝”。

①[清]谢树森等编撰,刘润和校注: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,第49-50页。

②[清]谢树森等编撰,刘润和校注: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,第50页。

③[清]谢树森等编撰,刘润和校注: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,第53页。

④[清]谢树森等编撰,刘润和校注: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,第443页。

⑤[清]谢树森等编撰,刘润和校注: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,第446页。

⑥[清]谢树森等编撰,刘润和校注: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,第50页。

⑦[清]谢树森等编撰,刘润和校注: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,第23-24页。

至清代，元宵赛灯，晋商表现令人称道。康熙四十七年(1708)，“元宵赛灯，晋商技高一筹”。晋商李道民“取沙竹蔑片制鱼蟹鹰鸢，其状栩栩。走马灯尤精善，彩绘《水浒》《西游》人物，衣冠、行止盎然成趣，观者啧啧称绝”。晋商王复礼“以沙枣巨枝结扎成树，悬玲珑灯笼数百枚，繁星点缀，灯花耀眼，成一时之盛景”。^①这不仅丰富了民勤民众的节日精神生活，而且使民众也受到了艺术熏陶。

(三) 吸收外来雕塑艺术

外来客民为民勤带来了雕塑艺术。明成化十年(1474)三月，精于雕塑的河北遵化客民陈徐来、祁霜月“由凉州至镇邑，为造苏子卿生像、马昭生像、郭震生像、金日磾生像、金安上生像，俱精妙绝伦，栩栩如生。尤以马昭最善，眉眼口鼻，一如真人。发须为微风吹拂，恰似出征凯旋；神态自若，而微露清傲之气，令目者肃然起敬焉”。^②苏子卿即苏武。为民勤历史上的乡贤塑像，表达的是人们对乡贤的尊崇和爱戴。另一方面，这些“精妙绝伦”的塑像，代表了当时民勤的雕塑艺术水准。

(四) 利用外来冶铁技术

民勤冶铁技术深受山西的影响。明景泰四年(1453)五月，卫指挥重用擅长冶铁术的山西客民祁世泰开设冶铁坊，冶铁并制造铁器。卫指挥筹金五千，创冶铁坊二处。一在红砂铺，一在城东南隅。额定红砂堡冶铁例一万八千斤，城内冶铁一万三千斤。共征铁一万四千斤，余一万七千斤。制造的主要器物有马刀、小刀、镖头、矛头、铁劳、铁索、斧头、铁铤、镢头、犁铧等。

(五) 学习外来建筑技艺

民勤建筑技艺，深受江南影响。顺治元年(1644)，江南人朱正芳任镇番经历，其人“博学强记，精书法，善丹青，尤擅土木营造之术。尝于龙潭筑木楼，高四层。远岫横空，乱峰列翠，绿荫一带，碧流四周。营造之精，犹如滕王之阁；风景之美，恰似黄冈竹楼”。据《镇番宜土人情记》记载：朱正芳在龙潭“筑木楼，颜之‘灵窟卧龙’，为镇番八景之一”。^③朱正芳带来了江南高超的建筑技艺，并著有《边隅建置图记》一书，为民勤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遗憾的是其书在战火中遗失，未能流传下来。

受外来建筑技艺的影响，民勤建造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建筑，如灯山楼。史载，“县有灯山巷，巷有灯山楼，規制恢闳，造工奇巧，每为士官达贵宴筵之所”。^④贡生李曜东，尤擅营造建构之术。“镇邑关庙一梁八担之设，盖创乎公之手也。”这都体现了本地建筑师的建筑水平。

(六) 引进外来造船技术

民勤造船技术，也来自南方的客商。清顺治十八年(1661)，南方人张宗琪，到镇番贸易。他“凿木为舟”，从西河划船北上鱼海，“缘湖环游，好事者骑马观望”。次日，“虽阴霾而有大风”，张宗琪再次出发，收获鱼虾数篓。“其后每出，满载而归。归而售于市，利颇丰贍。”^⑤

(七) 刻印书籍，传播文化

民勤刻印书籍技术，则来自河南。清康熙二十六年(1687)，圣容寺、地藏寺延请河南工匠

① [清] 谢树森等编撰，刘润和校注：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，第240页。

② [清] 谢树森等编撰，刘润和校注：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，第46页。

③ [清] 谢树森等编撰，刘润和校注：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，第183-184页。

④ [清] 谢树森等编撰，刘润和校注：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，第314页。

⑤ [清] 谢树森等编撰，刘润和校注：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，第207页。

刻印经书二十四种三百五十册，其间《表符牒榜文汇集》，尤其受读者青睐。

此外，崇文社和苏山书院也刊刻书籍。康熙五十二年(1713)，崇文社创立印书坊，主刻佛、道经书，兼及时艺、名刺等。乾隆四十七年(1782)，教谕王时泰“招募名师，开设刻印作坊，穷搜前代遗著，与王史并称学界旗帜云。”^①王史为王时泰前任镇番教谕。嘉庆十四年(1809)，“(苏山)书院刊刻《苏山时艺纲鉴》，路彩云主编，谢集梧协编。所选类金本邑明清两朝乡会试硃卷之优者，尤足裨益后起，宏扬前贤之卓裁。每文举引原批原评，卓有见地，可谓方家城府也。”^②由此可见，佛教、道教经书、乡会试硃卷等的刊刻，便利了人们对佛教、道教经典的阅读，特别是对科举生员提供了专门的阅读资料，这对民勤文化传播具有重要影响。

三、明清时期民勤宗族及其对文化的影响

(一) 民勤宗族的形成

明清时期民勤宗族的形成，主要是外来官员在民勤任职，其后代不断繁衍，最终形成了大宗族。明清时期民勤宗族，不仅是经济上的大族，而且是文化教育上的大族，他们对文化教育的积极作为，有力地推动了民勤文化教育的繁荣。

明代民勤宗族，以李氏、王氏、彭氏为代表。

永乐元年(1403)，李氏始祖九二为扬州府高邮人，以小旗调迁镇番，家族得以繁衍。宣德四年(1429)，“北直小兴州人李忠，调镇番卫掌印指挥，授卫守备昭勇将军”，始居镇番。据《镇番宜土人情记》记载，“王刚，原镇番营掌印指挥王兴之孙，千户王义之子也。原籍江南滁州，自始祖(王)兴于洪武初调任本邑，因家与镇焉。”王刚之子王贤，“修卫开学，有功民社。”谢广恩曰：“王氏乃吾邑望族。”^③“彭铉，江南凤阳人氏，先世俱以文选称。”其父彭成授世袭指挥僉事，彭铉“以父荫迁，授镇番卫指挥僉事”，“世职镇番，因家与焉。”据《镇番宜土人情记》记载，“今镇邑彭氏，凡三十七户，一百六十口，尽皆其始祖谿之苗裔也。原籍江南凤阳，有明后改官至镇。历传七世，或以明经正选，或以武功显扬，代不乏人，称望族焉。”^④

正统十二年(1447)，王柱泰著《镇番户族小识》，达三十万言。“统本邑实有户族姓氏，凡一百九十。”其中对何氏的记载，“其族也，盖阶州原籍，因家与焉。初不过十余口，繁衍播迁，历传十世，遂成望族。今户八十，口六百五十余。一支居于川，一支居于湖。祖莹在川，宗谱在湖。数代俱以武功显，英才辈出，与有国勋，造就地方，民社赖之。”^⑤

《镇番户族小识》“序”综述一百三十二姓，其中大姓多源于移民。除何氏、白氏、范氏源于陕西阶州文县(今甘肃文县)、伏羌(今甘肃甘谷县)、陕西华亭(今甘肃华亭县)属今甘肃外，其他族姓则源于浙江、安徽、陕西、河南、山西、江西、江苏、四川等省。宗族来源的多样性，带来了全国各地的文化，使其成为镇番文化多样性的源泉。

明清时期，马氏、孟氏、卢氏、谢氏皆为民勤望族。

马得，马氏始祖，直隶北京顺天府蓟州遵化县人，随宋国公冯胜征河西，任指挥同知。其子马麟任都指挥使。其孙马昭亦任都指挥，监工展筑镇番卫城，并于成化五年(1469)“移建圣容寺于城西南隅，筑钟楼、鼓楼于寺前。”《马氏宗谱》曰：马昭“累功升都阉，再守兹土。事事造

①[清]谢树森等编撰，刘润和校注：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，第324页。

②[清]谢树森等编撰，刘润和校注：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，第355页。

③[清]谢树森等编撰，刘润和校注：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，第30页。

④[清]谢树森等编撰，刘润和校注：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，第31页。

⑤[清]谢树森等编撰，刘润和校注：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，第36页。

端，开辟旧城，以广民居；添设马营墩塘，筹牌络绎。至于城楼角楼、学官公所、铺舍仓场与夫城市牌坊、圣容寺钟鼓楼，皆我祖之所建也。厥后阵亡，敕封镇国将军。春秋二祭，配享于苏(武)、金(日磾)二公。都人士感公栽培之德，每至三月清明，备陈清酌，仰祈灵飨，竭诚凭吊焉。”^①谢广恩曰：“夫镇邑之民，举凡说文，必以卢氏生薰为最；说武，则必推马公昭为魁，何耳？盖卢公为镇邑第一翰林，而马公则为镇邑第一将军也。”^②

孟大都，为浙江宁波人，曾任甘肃庄浪正印千户，“告归故里”镇番，“开学授徒”，兴办教育。其后人孟良允于顺治四年(1647)迁升浙江右布政使。其后裔一鲤、一豸、良范、良允，“皆有勋绩，人所钦慕。”

雍正元年(1723)，卢氏兄弟金榜蝉联。卢生薰中式第十三名，卢生英中式第四十一名。生薰连捷会试第十七名，殿试第二甲第五十四名，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。

乾隆四十二年(1777)，教谕谢鳌“性尤嗜学不倦，弱冠高登食飨。其为文力追秦汉，不蹈时蹊。教人先后文，循循善诱，成均既贡，益以高古文学振铎云川瀚海间。上下数十载，士弭弭信从，执经问难者几于舍不能容。得其指教，类能擢巍科以去。时，同里则有若李家泌，由举人官教谕；聂子烈，由恩贡官教谕；本族则有若登科，由进士官知县；子葆霁，幼子葆初，孙集成、集梧，皆后先膺乡荐，以振家声。其教泽孚遐迩又如此。生平仗义轻财，先是为诸生时，同社戚友会文供给弗少吝。有称贷者，悉焚券不责赏给，士林钦之”。谢广恩曰：“此谢英才辈出，代有闻人，所谓‘谢家一门三知县’，即此族之掌故也。谢葆霁，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举人，官山东安邱县知县；谢集成，嘉庆三年戊午科举人，官陕西直隶鄜州州同；谢集梧，嘉庆十二年丁卯科举人，官陕西渭南教谕。父子三人，鼎足而立，争相耀辉，实谢氏之荣，亦镇人之荣焉。”^③

由此可见，正是由于这些宗族重视教育与文化，开办书院，修建学宫，开馆讲学，才使宗族人才辈出，从而出现了明清时期民勤文化教育长盛不衰的局面。

(二) 宗族在文化方面的建树

明清时期民勤宗族在文化方面的建树，主要包括编修家谱、兴办文社、编修县志、修建宗祠等方面。

1. 编修家谱

编修家谱是宗族建设的重要内容。从明代至清代，民勤编修家谱的传统未曾中断。

嘉靖九年(1530)，“邑人彭广乃制《创修谱例》二十三条，晓示各家，以资参互”。^④谢广恩曰：“余所见之谱牒，不下数十种，载有是文者，惟四坝《何氏宗谱》一本而已。”^⑤《创修谱例》是编修家谱的指南和规范。

卢荣所编《卢氏宗谱》，深受好评。卢荣为嘉庆元年(1796)科试贡生，“聪慧颖悟，记诵天赋，屡蹶乡闾，遂无意功名。潜心研读，誓志读尽天下书。所编《卢氏宗谱》，发凡起例，刻求翔实，厘经分纬，纵横彻览。尤谱序一篇，洋洋数千言，考据确凿，论说辟透，文辞隽美，心

① [清] 谢树森等编撰，刘润和校注：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，第44页。

② [清] 谢树森等编撰，刘润和校注：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，第45页。

③ [清] 谢树森等编撰，刘润和校注：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，第318页。

④ [清] 谢树森等编撰，刘润和校注：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，第72页。

⑤ [清] 谢树森等编撰，刘润和校注：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，第74页。

构谨严,何公鉴衡评为‘语有根柢,笔具炉锤’。方家盛评,良有以也”。^①

见于《镇番遗事历鉴》的家谱主要有《何氏宗谱》《李氏宗谱》《彭氏宗谱》《马氏宗谱》《柳氏宗谱》《王氏宗谱》《卢氏宗谱》《郭氏宗谱》《蓝氏总谱》等。

2. 兴办文社

设立文社,组织雅集,为振兴民勤文化教育奠定了基础,营造了良好氛围。捐赠社资,为文社的运行提供了经费保证。如嘉靖三十一年(1552),前千户孟清告休归里,时年六十七岁。倡议开设千户文社,亲任主讲。康熙四年(1665),孟良允捐资三千缗,开办“共和文社”,聘汉、番士子入社学习。康熙二十五年(1686),何鉴衡、孝廉李一元、孙克明,贡生何鯤、李复膺等创立“春秋诗社”。“邑绅士王永禄慨捐二千金,用资膏火。岁之春秋,开社二期。春社二月初四至十四日,秋社八月初五至十五日,每期十天。社众数十人,届期不与者,初罚斗酒,执勤半载;再不与,除其名尔。”^②

嘉庆四年(1799)二月,“谢公集成筹设艺文社,邀诸生说经论文,辨析奥理,一时学风蒸蒸,士林茁茁”。^③

组织文人、士子雅集,赋诗作文,亦为文坛佳话。雍正十三年(1735),冬腊之月,崇文社邀诸名士作修禊之会。教谕张兴、邑举人卢生华等各制《镇番八精》诗八首,深受众人推崇。嘉庆七年(1802),苏山书院举行诗会,盛况空前。“学院师徒偕游柳湖枪杆岭,山长卢公金润并邀诸同人,欲仿兰亭以讽咏,复效竹贤而斗尊。林泉啸傲,师徒同歌西江月;湖山风流,士农携手浣溪纱。谢葆老(霁)咳吐成章,椽笔作一篇《枪杆岭游记》;卢山长七部能吟,信手拈得几束柳林湖‘竹枝’。游罢归来,掇辑成帙。凡文七篇,律诗五十首,词十五阙,杂以楹联百余副。工刻付梓,题曰《柳湖游览诗文辑录》。”^④

官员和士绅热情捐助资金,以“营运生息”为文社活动经费,有文社社长管理,这就为文社活动提供了经费保障。如嘉庆二十二年(1817),河南济源县举人李师唐任镇番县令,“倡建崇文社,积金取息,以给乡会路资,士林德焉”“李令师堂力昌闾邑士庶踊跃输金,创建崇文社。师唐有《建置崇文社碑记》”。其中云:“镇邑在国初贤良接踵,科第蝉联,文运之盛,甲于河西。”经前后几任县令倡导和捐助,“实贮崇文社银二千两整。即今盈实大家,分具领状,营运生息,用佐乡会资斧之需。议举公正社长二人,专司出入,以重责成。下余银两,备修邑乘”。^⑤崇文社所蓄捐资利息,主要用于资助乡试、会试生员,其次用于编修县志。

光绪二年(1876)二月,“邑侯力兴学业,延请吴来崔主讲苏山书院,门徒络绎,称一时之盛。”同年五月,“邑令钱崇基捐廉银五百缗,邑绅赞助一千五百缗,合二千缗,作为文社杜开办经始之费”。^⑥

光绪十一年(1885),“知县萧汝霖倡复崇文社,士林中人靡不响应,纷纷捐资。迄五端午节开社,已得二千余金。以一千金修整社馆旧宅,以五百金购置图书,以五百金用作社会经费”。^⑦

3. 编修县志

①[清]谢树森等编撰,刘润和校注: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,第339页。

②[清]谢树森等编撰,刘润和校注: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,第228页。

③[清]谢树森等编撰,刘润和校注: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,第343页。

④[清]谢树森等编撰,刘润和校注: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,第348-349页。

⑤[清]谢树森等编撰,刘润和校注: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,第370页。

⑥[清]谢树森等编撰,刘润和校注: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,第435页。

⑦[清]谢树森等编撰,刘润和校注: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,第441-442页。

陈尚敏认为，“科举家族编纂志书也是其参与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”。^①明清时期，民勤宗族参与编写卫志、县志也是一项持续性的社会和文化活动。

万历七年(1579)，“邑人杨大烈修卫志未竟，经划三载，乃著《镇番宜土人情记略》。凡六卷，曰‘疆域’、曰‘沿革’、曰‘山川’、曰‘形胜’、曰‘古迹建置’、曰‘事功’、曰‘风俗’七章。嗣后，邑令江鯤编纂县志，多所采录。”谢广恩认为，《镇番宜土人情记略》，即杨大烈之子“小泉厘定之《镇番记略》，后易名《边镇记略》是也”，与曹燮所纂《镇镇番宜土人情记》有别。“前者志书之例，后者通鉴例也。”^②后杨大烈著有《镇番疆域图说》，亦为后世编修方志的重要参考。

顺治十五年(1658)，吴攀桂继孟良允之后纂辑镇番县志。康熙三十八年(1699)，卢生华著有县志十卷。

谢集成对文化教育贡献良多。“时，学宫倾圯，公倡捐修葺，亲督工作，规制重新。又偕同人捐立文社，助乡、会试川资，复以盈余主修邑志，事赅文简，镇于是始有专志焉。”嘉庆二十二年(1817)，“孝廉谢公集成，于是年八月会中州刺史李权，筹措资斧，谋修邑志，共醵金二千余缗。后谢选授任职，事因搁置。”^③

道光三年(1823)，甘肃环县人敬联星任镇番教谕。周树清编修《续修镇番县志》云：时值纂修邑乘，敬联星“考订遗缺，究诂疑难”，颇受时人赞赏。

道光五年(1825)三月，许协奉宪札纂修县志，倡先捐廉，阅三月而书成，凡五册十卷。卷首由许协、谢集成撰序。《镇番县志》主修为镇番知县许协，总修为同知陕西鄜州直隶州事谢集成，纂修为吏部拣选知县谢集梧、吏部候选知县曹秀彦、康以直，总修、纂修四人皆为镇邑举人。

道光六年(1826)，举人曹秀彦，曾任陕西肤施(今陕西延安市)教谕。“秩满归养，事亲以孝闻。咸丰辛亥，举孝廉方正。三设里塾，重讲书院，尤以敦品励行为先务，数十年桃李成荫，门下如进士傅培峰，死宜黄难，此其表表者。其余科甲蝉联媲美，卢氏植、桂居焉。嗣纂修邑乘，体例精严，不愧史才。至监修学宫，劝立文社，凡学校公益，皆毅然自认，不敢告劳。邑侯周古渔、李杏南尝赠联语以表其品学。”^④

道光七年(1827)，“《镇番县志》由邑人谢集成裁定。付诸剞劂，初定五百部”。^⑤

正是由于这些宗族名士从明代至清代长期坚持和不懈努力，才完成了《镇番县志》的编修，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方志资料。

4. 修建祠堂

“祠堂是祭祀祖先所在，也是管理族人的地方，祠堂维护也是宗族的重要事务。”^⑥

在修建祠堂方面，最著名的当属何氏祠堂和孟氏祠堂。

何氏祠堂从明崇祯至清康熙有四次修筑。崇祯四年(1631)，“邑人何希闵卜地三坝李二沟，费五千金筑家祠，名‘何氏宗祠’，祀忠勇将军何相。……《镇番宜土人情记》曰：何氏宗祠建于崇祯年间，祀忠勇将军何相。逢正月十七祭日，朝拜者络绎不绝，差比关岳之盛”。^⑦何二公祠

① 陈尚敏：《清代甘肃科举家族与地方志编纂》，《上海地方志》2023年第3期。

② [清]谢树森等编撰，刘润和校注：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，第115页。

③ [清]谢树森等编撰，刘润和校注：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，第371页。

④ [清]谢树森等编撰，刘润和校注：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，第385页。

⑤ [清]谢树森等编撰，刘润和校注：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，第387页。

⑥ 常建华：《碑刻所见明清民国陕西宗族制度与风习》，《安徽史学》2018年第2期。

⑦ [清]谢树森等编撰，刘润和校注：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，第165-166页。

堂于顺治六年破土，顺治七年五月竣工。康熙三十二年(1693)，“何氏九世祖何鉴衡于六坝卜地筑何氏大庙成。庙貌巍峨，推为邑之巨构也”。^①

孟氏祠堂则修建于清康熙年间。康熙三十四年(1695)，孟祥、孟瑞等孟氏裔孙募资于城南二里许筑孟公祠。

总之，明清时期大量移民进入民勤，垦荒屯田，农业蓬勃发展，人口大量增加，商业贸易兴盛，使民勤经济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。与此同时，移民在兴办教育、融汇外来风俗、吸收外来雕塑艺术、利用外来冶铁技术、学习外来建筑技艺、引进外来造船技术、刻印书籍与传播文化等方面，都对民勤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宗族对民勤文化影响深远。外来官员在民勤任职，大多定居下来，其子孙连绵繁衍，形成了大宗族。宗族重视文化教育，参与文化教育活动，培养了大批人才，使民勤出现了“文运之盛，甲于河西”“谢家一门三知县”的盛况。宗族在文化方面的建树，还包括编修家谱、兴办文社、编修县志、修建宗祠等。移民、宗族与文化的良性互动，成为明清时期民勤社会发展的原动力。

正是因为明清时期的民勤文化注入了外来文化元素，多元文化相互融汇、相互吸收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勤文化，使民勤文化呈现出开放、包容、多元的特点，也使民勤成为丝绸之路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区域。

[责任编辑：王红成]

^① [清] 谢树森等编撰，刘润和校注：《镇番遗事历鉴校补》，第232页。